

旧书笔谭

薛冰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一本书，如果已经到了韶华褪尽、蔫头蔫脑，甚至创伤累累、肢残体缺的程度，还能引起人们强烈的阅读兴趣，它才可以被称为旧书。

旧书笔谭



旧书笔谭

薛 冰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杭州葛岭路1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摄影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字数 150 千字 印数 1—3000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36-463-X/Z · 225 定价:16.00 元

旧书与新书(代序)

旧书都是从新书而来的。

正如每一位老人都曾年轻过,每一本旧书也都曾有过簇新时的挺括与帅气。然而,也正如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活到古稀耄耋的高寿,不是每一本新书都能有幸成为旧书的。

有的人活着,就已经死了;有的书还新着,也就已经“死”了。经常看到整捆的新书被卖到废品收购站,等着送往造纸厂化成纸浆,最初也曾经为之叹惋,后来才懂得,那已经是它们最好的去处了。记得60年代末,某些人为了“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印特印所谓的《读报手册》,曾经被毛泽东讥评为“一批蠢人,一堆废纸”。时过境迁,“废纸”的产生不但源源不绝,且花样翻新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不能不感慨“蠢人”的进化!对于这样的文字垃圾,人们等不到它旧下来,便迫不及待地要毁之弃之,也就不足为奇了。

苛刻地说,一本书,如果已经到了韶华褪尽、蔫头蔫脑,甚至创伤累累、肢残体缺的程度,还能引起人们强烈的阅读兴趣,它才可以被称为旧书。

相比之下,旧书便比新书多了点什么。

一本书能“活”到几十岁、几百岁、上千岁,成为名副其实的旧书以至于古书,甚至化身千万,不断再生,自然不会没有原因。还是用人来作比喻吧,一个人的耐看度,其实与

2 \ 旧书与新书(代序)

年龄、与外貌、与地位、与包装并无太大的关系,或者准确地说,一个人的风度、气质,一个人的生命力,更多地取决于他的内在质量,取决于他自身的文明程度、文化素养。所以报刊上有时登出文化老人的照片,总是比正当令的影星、模特更能赢得读者的敬意;所以有的书越是饱经沧桑,越是被世人视如拱璧!

古旧书,该是经受住了历史与时间检验的书。

当然,这还只是古旧书中的一个层面,或许也可以说是古旧书中最有价值的一个层面。如果旧书的构成就是这样单纯,那么也就少却了许多趣味,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读书人和藏书家对古旧书情有独钟,为古旧书一掷万金!

金庸先生在一部武侠小说中,写过一个喜剧性的人物,她为对手所伤后,隐身世外数十年,练成一套绝世神功,然而待她出山寻仇时才发现,所有的仇家都已经死了,于是她悟出一条真理:一个人只要活得够长,就足以“打败”所有的对手。

一个人只要活得够长,就有可能成为人中龙凤。

一本书如果存在得够久,也就能够成为书中瑰宝!

毋庸讳言,由于各各不同的原因,有一些平常的书,以至平庸的书,没有什么阅读价值的书,也侥幸地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后世的人们在追寻那些确有使用价值的古旧书而不得时,往往也会对它们没出息的同辈书加以青眼,以聊补自己失望的情怀。这些书的价值所在完全得自于它的“古”与“旧”!只有真正的学问家,才会关注这其间差别,次一层的读书人,尤其是只奉“物以稀为贵”为绝对真理的收藏家,便心满意足地为囊括得的宋版元刻而津津乐道、喋喋不休了。

一如货币史上的优币总是不得不让位于劣币,天长日久,古旧书的定义也就难免渐渐趋于世俗化。

在今天,重新追求古旧书概念的纯洁化,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前面说过,古旧书的珍贵最初由于它的使用价值,或者因为其保存了某一历史时间或历史空间的真实信息,或者因为它更接近于作者原稿的本来面目。然而,由于印刷出版手段的大进步,古旧书的上述优势已完全可能被后出的版本所包容。除了宝塔尖上的少数研究者,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新版本的使用价值肯定高于古旧书。

不过,这并不能影响古旧书已经取得的历史文化地位和日益上升的经济地位。同样,这也不会影响人们寻访古旧书的兴致和热情。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在一个闲暇的夜晚,邀上几位所见略同的朋友,怀揣数册旧书,手捧一杯清茶,叙一叙访书途中的轶闻逸事、酸甜苦辣。

目录

- 1 旧书与新书(代序)
- 1 晚清的版权保护例证
- 4 商官、官商与招商局
- 7 专家、学者的《读书指导》
- 10 中央大学的几种藏书印
- 14 擦肩错过的珍本
- 18 从《学习白求恩》到《纪念白求恩》
- 21 《俞庆棠先生纪念集》
- 23 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重要史料
- 25 手稿本《中国土地问题概述》
- 28 选家的眼光

30	京派小说的一次检阅
32	《冰心选集》与“一折书”
35	得《文学发凡》记
37	我的“鲁迅研究”
45	《岭东恋歌》与李金发
47	百年回首《猛虎集》
49	周瘦鹃与《曼殊遗集》
51	黄炎培和他的《苞桑集》
54	闲话周越然
57	周作人的汉奸文字
60	维特的烦恼与歌德之创造
62	瑕不掩瑜的《南楼随笔》
64	《新疆见闻》与作者卢前
67	二合一的杂志《茶话》
69	《新大陆圣路易博览会游记》
72	20 年代的世界博览
74	70 年前的精彩预言
78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亚洲内幕
83	《德国军人丛画》随记
85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
87	《辛亥革命文献展览会纪念册》
90	“人民的战史”
92	无锡古城的八日惨史
96	桃花扇底送南朝
100	“清流”的悲剧
104	“沧桑词客”与《沧桑艳》
107	不堪回首咏明事
110	罗振玉与《万年少先生年谱》

- 114 南京词人的几种著作
- 119 陈宝琛和他的《沧趣楼诗集》
- 122 王国维自沉的一面镜子
- 126 帆影楼边伤心事
- 130 吕留良手札石印残册
- 135 宣统年间的木活字印本
- 138 变革之际的一乡泰斗
- 141 不可多得的乡邦文献
- 145 半生收拾钓台集
- 148 张惠衣与《金陵大报恩寺塔志》
- 152 最早的白话游记集
- 155 世纪初的一种百科全书
- 157 《小说的杭州西湖指南》
- 159 “读经救国”的奇谈怪论
- 161 旧式女性作品的最后检阅
- 163 “要会做诗，然后有趣”
- 165 《双桥随笔》与影印《四库全书》珍本
- 168 “劝世”奇文《集贤录》
- 171 日本版《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
- 173 《南阳汉画像汇存》及其他
- 177 一种别致的清人自画传
- 183 失而复得的《纫斋画牘》
- 186 《三国演义》的一种绣像
- 188 世纪初的女性时髦
- 191 《龙女画传》与梅兰芳
- 193 从七巧板到《益智图》
- 195 百年前的日本花道文献
- 198 书海慈航

晚清的版权保护例证

友人蒋晓星赠我旧书数册，内有《哲学要领前编》一种。此书系日本人井上圆了著，罗伯雅译，上海广智书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排印线装本。全书约三万字，分为十一章，依次为绪论、东洋哲学、支那哲学、印度哲学、西洋哲学、希腊哲学三章、近世哲学三章。就内容而言，此书亦属于西学东渐之际的启蒙读物，今天已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井上圆了君在谈到东洋哲学时，坦率地承认：“日本古来诸学诸教，皆自支那传来，不闻有一国固有之学，故东洋哲学，唯支那印度两国而已。”倒是比今日某些日本人尊重历史。

此书的有趣之处，是在其封二上印有清代地方政府保护版权的告示二则，因此成为中国版权保护进程中一个特殊阶段的例证。

“钦命二品顶戴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袁”三月初二的告示说：“本年二月十二日接英总领事霍来函，以香港人冯镜如在上海开设广智书局，翻译西书刊印出售，请出禁止止翻刻印售，并行县廨一体示禁，附具切结声明局中刊刻各书均系自译之本等情，函致到道，除分行县委随时查禁外，合亟出示谕禁。为此示仰书贾人等一体遵照，毋得任意翻印渔利，倘有前项情弊，定行提究不贷，其各凛遵毋违，切切特示！”“钦加三品衔赏戴花翎在任候选道特授江苏上海县正堂汪”三月十七日的告示说：“奉道宪札，接英总领事霍来函，以香港人冯镜如在

上海开设广智书局，翻译新书刊印出售，请给示禁止翻刻印售并行县廨一体示禁等由到道，札县示禁等因到县，奉此合行出示谕禁。为此示仰书业人等知悉，嗣后不准将广智书局刊译各种新书翻刻出售。如敢故违，定干查究，其各凜遵，切切特示！”

广智书局创办于 1898 年，曾出版多种自日文译出的师范教育和社会科学著作。梁启超在日本编的《新民丛报》即由该局发行，最早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是这份报纸。梁氏的《戊戌政变记》、《饮冰室文集》等亦由该局出版。林纾所译《茶花女轶事》最初也是广智书局出版的。此外，该局还出版过吴沃尧的几种谴责小说，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等，在出版史上是起过进步作用的。

以官府告示禁止他人翻印盗版，并非自清末始。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载，早在南宋年间就有出现，然而当时只是少数“有力之家，声气广通，可以得行其志”，似乎更偏重于商业保护意味；而官府刻书不但不禁人翻刻，且鼓励人交纸墨工价代印，或租版自印阅读甚至出售。到元代，以官府告示保护版权的情况虽稍有发展，仍未能形成相应法律。至于明人刻书之滥，早有定论，更谈不上保护版权。

直到晚清，版权保护问题才又一次被提出来。开始只有少数能攀附洋人或依仗官府势力的书商才有保护自己权益的可能。如前引广智书局，是由英总领事出面办的交涉。此外还见过苏松太兵备道的两件此类告示，一件是为官办的南洋公学译书院所发，另一件是为“中、东绅士”所办的东文学社所发。而在全局上，政府对于出版物则只有审查惩处的法律，如刑律盗贼类有“造妖书妖言”的严惩条例；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由商部、巡警

部、学部会定的《大清印刷物专律》，仍只谈注册、审查和惩治，以将近一半的篇幅大谈其对“诽谤”和“教唆”的处置办法，却一句不论及版权保护。然而，由于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出版行业纷纷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斗争，许多出版者不再乞求官府的公告，自行在书前或书后标明“版权所有，不许翻印”字样。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到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终于不得不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 □

商官、官商与招商局

旧年岁尾，偶然收得一册《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册》，是1947年12月的出版物。仿佛预见到自己的命运即将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招商局在75周年纪念日，特别出版了这样一份长达三百页、附表数十种的全面总结。书前且有图版六十余页，为招商局自李鸿章以来历届首脑的照片及民国政要的题词，还有招商局当时所拥有的四百六十艘船舶与有关设施的分类图版等。此后是关于招商局的历史回顾，船舶简介和各地产业简介，债务清偿记，七十五年来的编年纪事，国内外航运事业的介绍与论文等。这本十六开的大书，为有意研究招商局发展史的人，提供了一份完备而翔实的材料。

我于航运是外行，对这本书发生兴趣，完全是因为招商局的前身——轮船招商局，堪称为洋务运动的重要标本。这个由李鸿章倡议筹建、创立最早也维持最久的非军事性现代工业，可以说经历了洋务运动的典型过程，在所谓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以及进入民国后的官督整理、国营等每一个阶段，都由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官商或商官直接控制操作，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官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官”的活剧。它的发展历程，不但是中国现代工业史的一个缩影，更是中国新一代官商生成过程的忠实写照。

1872年，当李鸿章为轮船招商局寻求官商合办的形式时，他所借鉴的多半不是西方式的合股公司，而是中

国政府的盐务专卖政策与民间传统的合伙商号经营方式。受他委派负责筹备开办事宜的朱其昂，则是一个商人出身的官吏，如同当时的此类时髦人物一样，他头上戴着捐来的顶子，手上仍做着自己的漕运生意。因为朱氏没能招募到足够的私人资本，第二年他便被前买办唐廷枢所取代。唐廷枢这样的商人总办，果然较易得到商界的信任，加上中国的国情是商人对官方的支持历来有盲目的看重，所以股东与股金都迅速增加，使官商合办得以实现。

由于唐廷枢挪用资金发展私人产业致使李鸿章遭到弹劾，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头衔也随着唐氏而消失，继任的盛宣怀以督办的身份开始了官督商办阶段。盛宣怀与唐氏不同，他出身官僚世家，是李鸿章的入幕之宾，可是这位由官而商的“官督”带给轮船招商局的，除了官僚主义管理方式，便是更加严重的裙带风和营私舞弊！其直接结果，是当时人已指出的“本集于商、利散于官”，即利用商人资本从事经营获取的利润，落到了有关官员的手中；而在经营受挫时，却将损失转嫁到商人头上，冷酷地折损他们的资本。这种情况，使商人的投资热情锐减。当此之际，盛宣怀填补亏空的办法，不是改善经营，争取盈利，而是一方面设法谋取国家的贷款支持，一方面鼓励官员及其亲友进行投资。这种公私混淆的集资方式的必然结果，是国家的资本陆续变成了官员资本的红利，迅速加剧着官场的腐败。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用各种假象来粉饰他们所参与经营的实业，以便获取更多化公为私的机会。虚假的实业繁荣使盛宣怀成了当时“最有成就”的官商，逐渐爬向官僚统治阶级的上层。然而实际上，本以为会成为政府摇钱树的实业，却成了连年亏损的无底洞，以致到了清朝末年，不得不全部移交商办。

19 世纪后半叶洋务运动的种种弊端，并不是直到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不堪一战全军覆灭才暴露出来的。然而当时的社会机制中却缺少对于这种种腐败的制约力量，单靠几位御史爷的弹劾，哪里抵挡得住白花花“银弹”的威力！这场以发展现代工业开始的浪潮，在国人和洋人两方面都没有获得好评，是颇富戏剧意味且发人深省的。



专家、学者的《读书指导》

近年以来,中国出现了新一轮读书热潮。各报刊纷纷开办“读书版”,介绍淘书、读书、用书、藏书以至著书方面的知识。但就读书指导而言,则多是读书人的夫子之道,或偏重于一时的感悟体会,或偏重于一书的品味心得,成系统、分学科地请专家、学者作读书指导,则不大看得见。这大约是由于报刊的版面有限,通常只能登小块文章;但深层的原因,则很可能在于今天社会上的浮躁心理泛滥,读者、编者甚至于作者都缺乏必要的耐心,大家来玩一场“短、平、快”,在同样的低层面上公平竞争,看上去热热闹闹,谁也不落伍,谁也不吃亏。

其实这里面一定有谁吃了亏。只是这吃亏,也不是在浮躁的烟岚中所能看得清的,必得经过时间的淘汰与沉淀,才会显现出令人痛心疾首的后果。

之所以会想起这些话头来,是因为看到一本旧书——商务印书馆1935年8月初版的《读书指导》(第一辑)。这本书依次从心理、伦理、社会、统计、政治、法律、经济、商业、语文、音韵、算学、天文、化学、物理、地质学、生物学、医学、农业、艺术、文学、历史、考古等二十余类学科,约请国内学术界“雅负时望的专门学者,用浅鲜的文字,透彻的理论”,撰写了三十三篇文章,“详述其内容范围”,并“各将欧美古今学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撰述人自身的研究经验,融会贯通,为读者开辟新的途径。不但使读者对于高深的学术,可于最短时间获得研究的

门径,并且还能诱引他们在理论上与实际上作精密的探讨,而进窥各科学术的堂奥”。

书前有编者导言。原来这些文章,本载于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的“读书指导”专栏,“不意此举竟蒙读者特别赞许,自读书指导一栏发表以来,备受各方的欢迎,而来函要求汇刊为单行本者,日必数起,因此为酬答读者的盛意起见”,乃有此书的出版。编者强调指出:“现在正是读书运动的怒涛泛滥于全国的时候。提倡读书运动者的普遍的意见,都以为读书不是茫无头绪可以着手的,必然有读书的方法,而后所读的书方能有用,方能获得相当的、甚至圆满的效果……因此我们觉得刊印单行本,更是一种急切的需要。”

为此书撰稿的专家、学者,有些至今仍为大家所熟悉,如撰《怎样研究国语》的黎锦熙,撰《地质学研究法》和《小说研究法》的张资平,撰《动物学的研究法》的周建人,撰《植物分类学研究之方法》的胡先骕,撰《怎样读中国历史》的吕思勉等。有些姓名今日的读者则感到陌生,但书后附有撰述人履历,读来便可知道,参与此书撰述者,都非等闲之辈。如撰《化学研究法》的王璉,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兼专职研究员;撰《西洋画研究法》的王济远,时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副校长及绘画研究所主任;撰《医学研究法》的尹莘农,时任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校长兼附属医院院长;撰《财政学研究法》的李权时,时任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撰《民俗学研究导言》的林惠祥,时任厦门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撰《统计学研究法》的金国宝,曾被英国皇家统计学会选为会员;撰《音韵学研究法》的罗常培,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其余各位,也或为著名大学教授,或为有关方面专家。